

关于党史教学的几个辅导报告

胡 华

(内部参考)

3-5
10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北京师院政治理论教研室

资料室

一九七九年十月印

书	202
号	74 4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目 录

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历史人物问题·····	(1)
对党史课教学中若干问题的解答·····	(10)
对党史教学中一些问题的辅导·····	(31)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	(63)
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	(92)

(以上各篇报告皆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仅供内部参考)

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 历史人物问题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八日在山东省召开的
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讨论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这一次山东省开一个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的讨论会，我们来学习，和同志们见面，和同志们交流一下意见。那么，先谈一个前言，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以下讲关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请同志们多指正。

最近，五月一号到五月九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一个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个全国性的纪念会和学术集会。现在我们山东省接着又召开了有全国各地一百几十位代表来参加的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的讨论会。我们这个会紧接社会科学院的前一个会，可以说也是前一个会的继续吧，也是个学术会议。讨论的范围，可以说都是党史、革命史、现代史这个范围。从党史来说，前天教育部李正文司长也谈过，去年十一月有个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课讨论会，那也是关于党史、革命史、现代史的带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那么我们这一次济南的会议，也可以说是杭州会议的继续和扩大。这三个会都是盛会，讨论的中心，大体是一致的：一个就是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拨乱反正，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提倡实事求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精神，科学态度，提倡探索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这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根本原理；反对思想僵化，反对现代迷信，这是解放思想问题；这也就涉及到怎样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弄清历史上重大的功过是非问题，这就是三中全会的精神。

第一个问题，解放思想问题。我简单讲几句。这个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关系到能不能实现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不能够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么我们四个现代化就会是一句空话，就会落空。而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还是刚刚在开始，因为粉碎林彪、“四人帮”也还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三年，肃清流毒的工作，还需要不懈地努力，深入地进行下去，在各门学科都要深入地进行下去。大家都看了周扬同志的报告，周扬同志的报告把我们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五四运动以来三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五四以来，第二个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现在是第三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在开始。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纠正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现在纠正林彪、“四人帮”十年的极左路线，这又是一个新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都是我们写党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写党史脱离了这三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党史课本就脱离了最重要的思想内容。我们当前的中心课题就是放手解放思想，谨防思想僵化，谨防“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能动”之类的思想禁锢。五四时代第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了孔孟的老教条，当然从孔

子孟子他们本人来说，我们怎么历史评价，怎么一分为二，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将近两千年用孔孟学说作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僵化思想，这将近两千年的思想禁锢危害是很大的。人们的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孔孟学说禁锢、束缚、僵化了两千年。五四时期，当然从对立面来说，林琴南、辜鸿铭这一班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继续是僵化思想。那么从新文化运动当中的右翼来说，比如说胡适宣传白话文，我们应该加以肯定，有进步意义。但是他后来也是搞什么整理国故，贩卖实用主义，引导青年去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也还是僵化思想。而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五四时期的青年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等，他们在五四时期思想很活跃。毛主席当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曾经想和蔡和森同志一起在岳麓山那个地方搞一个新村，就是一块劳动，一块分配，新村主义。周恩来同志他到日本去留学，刚刚去的时候，他也相信过明治维新军国主义，以为可以富国强兵，他也相信过贤人政治。恽代英同志、陈延年同志都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都经过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也还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过程。所以说他们追求真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们思想很活跃。不能设想人们一开始就迷信一种东西，就认为是真理了，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的认知的过程。所以也要允许现在这一代青年人有一个思考探索的过程。当然现在青年人条件好多了，一开始能够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可以供他们学习，有许多方便的条件。但是要允许他们通过探索和思考，达到真正认识的过程，使他真正认识是真理。现在的条件，不象五四

时代青年那样了，因为当时接触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各种各样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新村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也有。经过这许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现在有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放在青年面前，引导他们学习，因此，社会上有一点点支流，就是青年思想有一点点混乱，这并不可怕，可以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会引导青年同志到真理的道路上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引起这些混乱，责任不在青年，而在林彪、“四人帮”搞乱了青年的思想。因为这一代青年，在他们懂事的时候，他们所接触到的大量的货色是冒牌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毛泽东思想。一个，就是林彪、“四人帮”及某顾问的冒牌的假社会主义，也就是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穷过渡”的、贫穷的、平均共产主义，也就是封建社会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给人民以贫穷王国，而他们自己是淫乐王国。二呢，林彪、“四人帮”、康×给他们的是假无产阶级专政，假的。林彪所谓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假的。也就是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张春桥、姚文元所谓的全面专政，也就是江青这位女皇的独裁寡头政治。再一点，就是林彪、“四人帮”、康×搞的假的所谓党的领导，也就是把党、团、周总理为首的人民政府、民主和法制统统砸烂，大乱天下，乱中夺权，实行江青、山东的王效禹之类的帮派体系的领导，把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领导冒充为党的领导。第四点，就是林彪、“四人帮”、康×的假马列主义，假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打着最最最最高举，更高的更高的高举这样的旗号，借高举以营

私，篡改、阉割、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拿起“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棍子来打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符咒化，念念有词，念符咒似的搞现代迷信，僵化思想，后来就演变成为“一句也不能动”。这是一条思想路线，也就是高举假马列主义、假毛泽东思想。我们今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坚持四个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一，就是真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二，真的无产阶级专政，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广泛的民主，只对少数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三，就是真正的党的领导，也就是三中全会讲的党的集体领导。四，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邓小平主席说的完整地准确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立场、观点、方法、革命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历史实际，当前实际），正确解决实际问题。讲真理，讲真话，反对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我们要具体分析，因为这一代青年，他一懂事时记着这么多假的东西，“假作真时真还假，”他们对真假一时分不清楚，因为林彪、“四人帮”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真假混淆，是非颠倒，所以青年们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拿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的四个原则来教育青年，批判、弄清、肃清那些假的东西的流毒，这就叫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此，青年们思想活跃是好的，思想混乱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思想僵化，一僵化，把林彪、“四人帮”这一套假的东西又灌输到青年当中去，就糟糕了，这对我们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对党的事业的前进，就糟糕了。比如

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昨天廖盖隆同志讲了很多。本来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建设三十年社会主义，发展无论如何也要比资本主义快、好，多快好省嘛。为什么我们发展慢了呢？就因为许多假的东西，错的东西起了作用。必须把这些假的东西、错的东西肃清，把鱼目混珠的鱼目拣出去，那么，社会主义这颗珍珠才能大放光明，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还刚刚在开始阶段，还是方兴未艾，任务很艰巨。从“四人帮”被粉碎到现在也不过是短短的三年时间，这在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还刚刚在开始，弄清楚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个问题刚刚提出来，原来弄得不很清楚，在三中全会才弄清楚，原来讲什么“极右实质”，还不是很明确。所以，现在不是收了，而是要大大的解放思想。

我们研究党史就需要深入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史课的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大家努力作扎实的探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写出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我们中国革命走过很多弯路，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实行了正确领导，但是党的历史上很多问题，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不是全党都弄得很清楚了。到一九四五年，这就是遵义会议以后又经过了十年，才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一九四五年到现在，又是三十四年了，这又需要写出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时候，一九四五年是经过了延安整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党史讨论。现在我们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要有一个党史讨论，把这三十四年的历史总结一下。我们来看，总的说，遵义会议后，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路线是很正确的，解放

战争时期，我们的路线也是很正确的，全党思想很一致，办法也很高明。解放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期，我们各种方针、政策都很稳当、很高明、很正确，发展也比较快。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就有个扩大化的问题，五八年以后有个刮五风的问题，三年经济困难，发生了马鞍形，以后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弄错的问题。演变到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横行，这一个历史现象长达十年之久，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华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解放思想，高举马列主义，顺应人民的要求，九亿人民的要求，一铁拳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真是人人高兴、个个称快！这个整整十年的动乱，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糟踏得不象样子，党风、学风、文风都糟踏得不成样子，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以说占到五分之一的的时间。这难道是偶然出现的吗？难道不是值得十分重视、认真总结经验的重大教训吗？所以，这就需要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出现及其灭亡，一个一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当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也就是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需要比较慎重地探讨研究，不能匆忙得出结论来。匆忙草率地作个结论，那也不解决问题，就象延安整风经过思想统一，经过详细的党史讨论，才写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我们党史工作者就是要认真地严肃地真正研究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文件、文告，弄清问题的真相，根据事实做出科学的论断出来。这样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作出科学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有了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才能够由中央编出一部新的党史课本出来。目前，看起来中央还顾不上来编一部新的党史课本，而这后一段党史没有一个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话，要编一部新的党史课本是有困难的。我们党史教员当然就更不行了，是不是？我们也就只能够讲到一九五六年，或者是讲到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右派以后有些问题就不大好讲了，我们也讲不了啦。关于“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理论是没有禁区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李正文同志前天讲了，我们可以探讨。课堂上当然也可以作些探讨，作些研究性的讲解，讲些研究性的意见还是可以的，在报刊上宣传就要更慎重一些。写成讲义出成书，当然难度就大了。所以，现在大家说党史讲到一九五六年八大，或者是一九五七年。在八大以前，或者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前，也就是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的说历史事实、理论观点，还是比较成形，我们比较有把握。过去，五七年以前这段历史，除了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的以外，总的说，我们过去建国后十七年写的讲义、课本、简史都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是对的。所以，不能因为后面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就取消党史课，把以前的一九五六、五七年以前的党史也抹煞，也一概怀疑，那就不对了，那是不行的。以前基本事实基本理论都还是正确的，可以讲的。过去文化革命前我们编过一些党史课本，粉碎“四人帮”后又编了一些党史课本，革命史课本，这些都还是有成绩的。当然林彪、“四人帮”时代，北京的“林氏春秋”，上海姚文元组织的写作班子，什么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那个两条路线斗争史，那

就不可信了，有很多歪曲篡改。所以，总的说，解放思想问题，宣传上我们要注意政策，但中心我们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讲真话，写真党史，这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谈谈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谈一下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下略）

对党史课教学中若干 问题的解答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东省召开的
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讨论会上的报告)

这几天因为赶一个任务，日以继夜，没有能抽出时间来参加党史讲义的讨论，听说同志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有收获，我没有能得到这个学习机会，很遗憾。

大家提到了党史课教学中的不少具体问题，要我也讲一讲看法。我没有带参考材料，单凭一些记忆，是很不准确的。这个发言，只供参考，不足为据，讲错、记忆错的地方，多请同志们指正。

社会主义时期部分，中央党校李葵元、张弓同志和别位同志都讲过意见了，我只就民主革命时期的有些问题谈点看法，介绍点材料，也叫做“齐放争鸣永不衰”吧！至于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说错了可以更正。

一、党的创立时期

1. 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起初叫什么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对其它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情况怎样？

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最早见于陈潭秋同志一九三六年发表在《共产国际》月刊上的《党的一大回忆》。他是采用联共（布）党和国际上通用的建党时期的一些小组的名称，把中国建党时期的一些小组的名称，也叫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大家写党史也就沿用这个名称。实际上，一九二〇年夏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发起建党时，经陈独秀同李大钊通信及同一些人商议，讨论过党的名称，是叫社会民主工党呢？还是叫共产党呢？当时确定叫“共产党”。因此，陈独秀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组织，实际上就叫共产党，或叫共产党小组，上海小组也叫共产党发起组，武汉和北京因为人数较多，在党的一大前，已经叫共产党支部。“支部”两个字是从日文中借用过来的。总之，名称问题关系不大。上海共产党小组是发起组，主要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各地小组从组织上说，是他们邀请的，比如长沙小组，是陈独秀邀请委托毛泽东同志组织；北京小组是陈独秀邀请李大钊同志组织；日本小组是陈独秀委托施复亮组织的；巴黎小组是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去组织的；广东小组是陈独秀自己到广州后，找了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北大同学组织的。陈独秀可算党的一个发起人。武汉小组是李汉俊邀请董必武组织的；济南小组则是李大钊派了北京小组成员陈为人到济南找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庄龙甲等组织起来的。从思想建设上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陈独秀委托李达办了党内刊物《共产党》月刊在党内秘密传阅，这是建党的思想准备。毛主席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也是起了作用的。当时小组是秘密的。

2. 说李大钊同志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根据是什么？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都是思想上的指导者。从五四爱国运动说，李大钊并不是直接的参与策划组织和领导。但他是思想上的指导者，他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发表文章和评论，通过同青年谈话、演讲，揭穿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强盗面目，痛斥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侵占青岛和山东，痛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和段祺瑞、徐树铮等的丧权辱国、残民以逞，热情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对五四运动的爆发直接造了舆论，做了思想准备。至于五月四日那天爱国运动的组织，是五月三日，北京各大学、中学有十几个社团在北大三院开会决定的，这些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辅社”“新潮社”“北大学生会”等等，可以说平时都是聘请李大钊先生作指导的，他对这些学生的爱国行动有很大影响。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亲自营救学生，帮助组织北大演讲队，亲自上街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积极了，例如，到天津去指导周恩来同志等“觉悟社”的会议，亲自参加一九二〇年八月的陶然亭会议，指导“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到民间去，做工农的实际运动，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北大学生办“亢慕义斋”，摘译马列原著，以至组织长辛店的工人夜校，发起共产主义小组。也就是说，他是不回避斗争的，他的格言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个人如果没有救国拯民的铁石肩膀，在道义真理面前不肯承担责任，不肯付出牺牲，见有利就上，见责任就推，把荣誉归于自己，把过错推卸给别人，那么他在道义上

和人格上就破了产。我们要学习的是李大钊这样铁铮铮的共产主义者的榜样。所以，广义的说，也可以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当然，不是直接策划五月三日的几个社团的秘密会议，不是出面指挥天安门的集会，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新青年》，可说是领导者、组织者。

3. 包惠僧算不算一大代表？算应该怎样写法？

一大前，包惠僧是武汉党组织的支部书记。武汉党组织是以武汉中学为活动基地，是陈独秀、李汉俊委托董必武同志组织的。董老是武汉中学的校长，日本留学生，在当时武汉，他已是社会名流，所以不便直接负责党组织的日常工作，就让包惠僧担任支部书记。一九二一年春，包惠僧到广州去找陈独秀汇报工作。七月间，党的一大要召开，陈独秀担任着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时去不了，陈独秀叫包惠僧同广东小组的陈公博一起去参加一大。在一大上他是以代表资格参加的，从头参加到尾。他这代表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陈独秀派他去参加的，他也就成了合法的代表。当时，各地小组都是秘密的，人数也不多，谁去参加代表大会，无非小组商议一下，推一、二个人去，并没有严格的选举手续。比如说，日本小组，只有东京施复亮，鹿儿岛周佛海两个人。因为周佛海暑假要回国，他二人通信商量一下，周佛海也就算代表了。法国巴黎小组，来不及通知，往返路费也太贵，大家都穷，也就没有派代表。毛主席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讲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代表，讲了有包惠僧，那是可靠的。全国解放前一些一大代表的回忆都说包惠僧是代表，那时没有人回忆他是列席，或是旁听，或是记者采访，或是没有表决权。他事实上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参加，我想应该尊重

这个历史事实，不应把他抹掉。后来是说，因为他不是武汉小组或广东小组推的，而是陈独秀派的，就不承认他。陈独秀派的，也就当了代表，这是历史，还是应该写十三个人。

4. 作为党的创始人应以什么标准来确定？

我党的创始人应写哪几个？

党的创始人，应该是指各地的发起创党的一些最主要的最有影响的实际负责人。如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董必武，山东的王尽美，法国巴黎的周恩来，都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法国巴黎小组本来是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去建立的，他发展了刘清扬、周恩来，以后国内又来了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二人在上海已参加了小组，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就让他们找张申府接上头，参加了法国巴黎小组。但张申府不积极做党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就严肃批评了他。在法国实际从事建团建党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其次是赵世炎、陈延年。我们看朱德同志同史沫特莱女士谈他在德国入党的经过，也足以说明周恩来是法国、德国党的负责者。朱德和孙炳文到巴黎找党的负责者，大家就告诉他们要到德国柏林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就介绍了朱德和孙炳文入党，所以，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5. 对陈独秀的一生应怎样评价才算恰当？

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我想可以类似列宁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也就是分前期和后期两段，从发展变化中看一个历史人物的演变。他在五四时期和创党时期，功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地写到党史上去。南陈北李，应该写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前面，因为毛、周是受陈、

李的影响和指导的，这是历史。当然，陈独秀在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也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差得多，普列汉诺夫在“劳动解放社”和同列宁办“火星报”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三次论战时期宣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很不高明，有很多错误观点。但是，“一大”选他做总书记，还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一定的功绩，并不是哪一个人指定的，象后来的王明上台纯粹是米夫指定的，强迫裁决的。陈独秀还是大家民主选举出来的，至于大家为什么要选他，这也是党在那一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是总书记，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但一九二三年以后他犯过不少右倾错误。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他对蒋介石、汪精卫失去警惕性，又压制工农运动，犯了路线错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产生了取消主义的观点。一九二九年他堕落成托陈取消派，被党开除，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此后，他在党史上就不值一提了。

6. 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二二年入党，但又说他在党成立前就参加了巴黎共产党小组，是否有矛盾？应怎样认识？

前面说过，一九二〇年冬，北京小组的成员张申府，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去当教师，陈独秀委托他在法国建立党小组，他发展了刘清扬参加党小组；一九二一年三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在巴黎又发展了周恩来参加党小组。所以总理多次说过他是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入党的，我就亲耳听总理一次报告时这样说过。接着国内又来了已在上海参加了党小组的赵世炎和陈公培（又名吴明），他们五人组成了巴黎党的小